



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Mu Dan (Zha Liangzheng):
A Poet and a Translator

王宏印 著



商务印书馆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

王宏印 著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王宏印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2667-0

I. ①诗… II. ①王… III. ①穆旦(1918—1977)—
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552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

王宏印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667-0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6½

定价:95.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序言：以诗的名义	1
----------------	---

第一部分 永不停息的生命

第一节 少年早慧	35
第二节 清华幽园	49
第三节 西南联大	57
第四节 生死战场	84
第五节 动荡岁月	106
第六节 赴美留学	121
第七节 南开精英	140
第八节 文革劫难	164
第九节 多事之秋	176
第十节 夕阳熠熠	193

第二部分 二十世纪桂冠诗人

第一章 新诗创作研究(一)	209
第一节 创作研究：分期与分类	209
第二节 作品研究：结构与特色	230
第二章 新诗创作研究(二)	248
第一节 主题研究：扩充与关联	248
一、劳苦大众	249
二、民族命运	254
三、战争思考	260
四、浪漫爱情	268
五、自我追寻	280
六、自然景色	286
七、精神信仰	292

八、文明反思	302
九、理念世界	307
十、诗歌艺术	313
第二节 动因研究:高潮与消退	317
一、前期创作:高峰体验	317
二、中期创作:艰难抗争	321
三、晚期创作:走向象征	323
四、回声:走出冬季	329
第三部分 译诗者,另一种诗人	
第一章 俄罗斯在召唤	335
第一节 从翻译《文学原理》开始	335
一、关于查良铮学习俄语和准备俄语翻译的追溯	335
二、翻译《文学原理》与当时国内文艺学三部著作的评论	338
三、《别林斯基论文学》:寻求一种编译的方式	344
第二节 学会沉默:《丘特切夫诗集》	349
第三节 像普希金钟情《奥涅金》	357
一、普希金抒情诗的翻译与修改	359
二、《献辞》与长篇叙事诗的翻译原则	365
三、多方重现《奥涅金》精神	367
四、不断逼近“奥涅金诗节”	375
第二章 随拜伦漫游:回到浪漫派	383
第一节 英诗翻译:浪漫主义风潮再起	384
一、雪莱:当西风漫卷的时候	385
二、在济慈的艺术之瓮上精雕细刻	390
第二节 哀希腊:“忧患意识”的回响	395
第三节 不朽的丰碑:《唐璜》的译竟	413
一、“不让我工作,就等于让我死”	414
二、“千万端机缘和你的火凝成”	416
三、《唐璜》:“中国译诗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	420
第三章 现代派译诗先驱	427
第一节 现代派诗歌:从头谈起	427
第二节 叶芝:我们知道了他的梦	432
第三节 艾略特:《情歌》与《荒原》	436
第四节 奥登的诗:让历史作我的裁判	448

第四部分 诗论家,谈诗论艺的人

第一节	独特的诗论:拒斥风花雪月与“抒情的放逐”	465
第二节	诗家谈译诗:要注意思想,也要表现旋律和风格	469
第三节	秋冬之交谈艺录:在关注现实与把握规律之间	473
第四节	文学批评:从现实主义上升到浪漫主义	477

补遗 穆旦诗:自译、他译及双语写作

第一节	自译、创作与修改	487
第二节	灰色地带:可能的双语写作	494
第三节	他译:诗歌变体与传播	503

结束语:诗人身后

附 录

一、穆旦(查良铮)生平年谱	520
二、穆旦(查良铮)著译编目	527
三、穆旦新诗意象小辞典	529
四、穆旦(查良铮)怀念诗选	563

主要参考书目	570
--------------	-----

序言：以诗的名义

中国在发展，中国文学在发展，中国的新诗在发展。

然而，许多事情，许多人物，和中国的文学和诗歌，以及和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其中有许多却被渐渐地淡忘了。

曾几何时，著名的诗人穆旦，“九叶诗派”的中坚，在不少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已经看不见了。穆旦的名字，在新诗和现代诗歌的历史书上，出现的已经很少了。在各种各样的诗歌选本中，已经很难找到他的诗歌了。

而翻译家查良铮，他的名字，还能在俄罗斯文学的译本中见到，还能在英国诗歌的译本上见到。不过许多时候，往往是和普希金或者拜伦的名字一起出现，才被人们谈起。作为翻译家，他的名字被单独提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在天津的南开大学，查良铮曾经居住过的校园里的房屋已经被拆除。当年穆旦写完一首诗出来散步的小树林，或小河边，也已经整治得面目全非了。

在查良铮曾经讲过课的课堂上，问起今日的南开外文系的学生，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穆旦就是查良铮，而且曾经就是这个学校的教员了。

在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工作过的图书馆，如今还有多少人借阅他当年在这里白天打扫厕所、晚上回家背着家人偷偷翻译、直到他死后多年才得以出版的英、俄著名诗人的诗歌呢？

为了这本来就已经很难很难的纪念，至少部分地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于2000年来到这所著名的大学任教，一面拜访他的家人和同事，搜寻他的资料 and 作品，想给这位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写一部传记，来纪念他，也让许多热爱他的诗和他译的诗的人们记住他，从而更加热爱他和他的诗，至少不要这么快和这么容易地就忘了他的诗和为了诗才活过一生的这位真正的诗人。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在翻译和出版了穆旦现代诗的英汉对照选注本以后，在写了几篇纪念诗人翻译家的文章以后，为穆旦撰写传记的准备工作也基本就绪了。接着，在经过了几年的准备和写作过程以后，这件事终于能如愿以偿了。

又经过几年的修改,数易其稿,一部厚重的书稿终于成型了。

此时,面对透过书房窗口的七月早晨的阳光,一部诗人翻译家的传记就要寄出了,然而,作者却恋恋不舍。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阅读和写作的缘故,作者已经和诗人穆旦、翻译家查良铮,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较之以前任何时候,我更了解穆旦(查良铮)了——更了解他的为人、他的遭遇、他的诗歌和他生命的意义了。并且通过他,通过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通过他的诗性智慧和诗化人生,我也更加了解中国和世界,以及中国和世界上的诗人了。

于是,中国近百年的艰苦历程,中国新诗的依稀景象,伴着诗人活动的身影,就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了。

一、硝烟散去,我穿越新诗的长廊

无论就中国现代诗歌史还是诗歌翻译史来说,诗人翻译家查良铮(九叶派诗人穆旦)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每当我们企图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并把翻译文学作为其中一个重要部分的时候,每当我们讨论现代诗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走向的时候,穆旦的身影就在我们的脑海里活跃起来了。我想,我们今天纪念穆旦,不仅意味着研究,而且意味着翻译,更应该意味着创作。只有让穆旦和他的新诗主题与精神在现代诗歌的行进中留下新的印痕,才能真正继承中国新诗和“九叶”诗派的精髓,让新诗园地在新的时代熠熠生辉。

三十多年前一个普通的日子,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时任学校图书馆管理员)查良铮先生因腿部摔伤住院医治拖延,引起心脏病并发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约五十年前,正值反右扩大化之风劲吹之时,查良铮受到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而他翻译的普希金长诗《欧根·奥涅金》出版问世。约六十年前,解放战争的第二年,穆旦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三本诗集《旗》,圆了一个年轻诗人的诗歌梦。约六十五年前,抗日战争的烽火烧得正旺,热血青年查良铮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经历野人山原始森林的九死一生,幸免于难,后来写了《森林之魅》等不朽诗篇。约七十年前,清华大学外文系增加了一名热情好学的优秀学子。后来,西南联大的墙壁上贴出了一首《野兽》,揭开了中国现代诗“野兽派”的序幕。九十多年前,也就是1918年4月5日(阴历二月廿四日),查良铮出生于天津市西北角老城内恒德里3号。他的祖籍是浙江省海宁县袁化镇,而查家是名满大江南北的望族,自然有一段不平常的历史。

1996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桂冠诗丛”之一《穆旦诗全

集》。整套丛书包括了“本世纪世界各大语种一流诗人”，穆旦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当代诗人，其“创作实绩和献身诗歌艺术的精神无愧于‘桂冠’的荣誉”。（见“20世纪桂冠诗丛出版说明”，即该书封面的书眉上）这个集子的出版，不仅“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而且奠定了穆旦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作为桂冠诗人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今天，对于诗人穆旦的创作研究，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课题。一般认为，鉴于穆旦的大部分创作活跃于1938年到1957年这一时段，而高峰时期则和“九叶派”诗歌运动相联系，因此广义地可归入“九叶派”的诗歌风格，属于20世纪40年代那样一种诗歌运动的范畴。当然，这样的归属，就有可能忽略了穆旦在解放后的诗歌创作，尤其是其晚年的诗风的改变。这是需要指出的一点。

中国现代派的诗歌创作，毫无疑问是受了西方现代诗歌风气的影响，但要完整地理解中国现代诗，还要把她置于中国诗歌发展的宏大的历史之中。中国是闻名世界的诗歌大国。以《诗经》《楚辞》为渊源，以唐诗宋词为代表，她的古典诗歌和诗论曾经达到过世界诗歌的顶峰。到了现代，受到中国古典诗词哺育的西方现代派诗歌反哺回来，以西学东渐的新的姿态，通过“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内在机制，中国新诗的诞生和发展又找到了新的契机和动因。这就是20世纪40年代异军突起的新诗高潮。就其中的现代派诗歌的艺术程度而言，这一新诗高潮所达到的高度，是一个迄今为止仍然难以企及和不敢轻言超越的高度。后来又经过了几十年的传统的断裂年代（台湾的新诗运动暂且不算在内），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崛起，才接续上了这样一个现代派诗歌的脉络。

40年代现代主义新诗在整个中国新诗史上占有高峰地位。它意味着中国新诗开始与世界诗潮汇合，为中国新诗走向世界做了准备。在40年代以前中国新诗的主要方向是从语言和感情、意识上摆脱古典诗词的强大影响。反叛、创新，以古典语言和思想感情，走向现代化是五四文学运动后新文学的创新总倾向。但一直到40年代，才因为形势的发展新文学获得突破，走向普遍的成熟。（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4页）

实际上，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运动所推向的诗歌高峰，如果在时间上再宽泛到前十年，即包括少数20世纪30年代诗人到20世纪40年代或稍后些，这样更容易看出中国当时的新诗是对中国和世界诗歌传统的一个总继承，或者说是当时中国种种矛盾的一个小缩影——都浓缩在以内外战争为背景

的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她的知识分子的挣扎、感受与呼救中。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在懂外语这一共同的语言基础上,分别继承了中外古今的诗歌传统而又各有侧重:偏重于继承中国古典诗词而又融合了某些现代主义写法的如卞之琳,偏重于借鉴继承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传统而略有文言味的如稍早的李金发,偏重于继承德国浪漫主义和奥地利玄思派的如冯至,偏重于从英美浪漫主义过渡到现代主义的如穆旦,偏重于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主义如唐祈、杜运燮等。在这一代新诗精英中,穆旦无疑是其中最有才华、最有成就的后起之秀。至于穆旦新诗的语言艺术风格,谢冕教授有一段十分中肯的描绘:

但穆旦更大的辉煌却表现在他的艺术精神上。他在整个创作趋向于整齐一律的规格化的进程中,以奇兀的姿态屹立在诗的地平线上。他创造了仅仅属于他自己的诗歌语言:他把充满血性的现实感受提炼、升华而为闪耀着理性光芒的睿智;他的让人感到陌生的独特意象的创造极大地拓宽和丰富了中国现代诗的内涵和表现力;他使疲软而程式化的语言在他的魔法般的驱遣下变得内敛、富有质感的男性的刚健;最重要的是,他诗中的现代精神与极丰富的中国内容有着完好的结合,他让人看到的不是所谓“纯粹”的技巧的炫示,而是给中国的历史重负和现实纠结以现代性的观照,从而使传统中国式的痛苦和现代人类的尴尬处境获得了心理、情感和艺术表现上的均衡和共通。(谢冕:《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见《穆旦诗全集》,李方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22-23页)

穆旦在中国新诗创作上的最大贡献,在我看来,就是塑造了“被围者”形象(详见穆旦诗《被围者》),使得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与“倦行者”和“寻梦人”三足鼎立的格局得以形成。“被围者”是一个人群,他真实地记录了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孤立无援的状态,以及急于突围得救的生存意识与消沉涣散的民族存在状态。“被围者”是一个自我,他生动地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处于强大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包围中而不得出的狂躁心态和沉沦过程。“被围者”是一种文化,他不写实体也不写关系,而是写一种个体群体在时间和空间化一的旋转和沉没的惯性中肉体无法自救、灵魂无法拯救的悲惨处境和悲剧氛围。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穆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被围者”,较之“倦行者”和“寻梦人”深刻得多,普遍得多。联系到中国在亚洲大陆的地理位置和内陆型国家的生态环境,作为一个基本上是封闭性大陆民

族的地理特征和心理状态，特别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所受地理位置和自然形态的局限，以及近世以来在不同的国际形势下一再被包围的状态和欲突围而不得出的文化窘态，“被围者”形象确实具有深刻的隐喻色彩和文化心理意义：

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
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
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
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更坏：

（穆旦：《被围者》）

作为智慧型诗人，即使一生未能杀出重围——身体的、环境的和心理的重重包围与围困，穆旦也很少流露出倦行的老态和寻梦的幻灭，倒是显示了始终如一的荒原意识。这是诗人穆旦一生新诗创作能保持形上高度和独立品位的文化心理动力学上的基本定位所使然，也是至今读他的诗仍然使人能在强烈的冲击和震撼之余感到“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的文化心理内涵的奥秘所在。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每年都会找一个时段，把《穆旦诗全集》拿来重读一遍或几遍，从中寻求新诗的动力并恢复对诗的敏感——意识的灵感和艺术的灵感。

穆旦诗歌的创作，虽然有很大的精神含量和情感动力，客观上记录了诗人一生经历的若干历史时期和重大事件，例如抗日战争（包括西南联大）、解放战争（国统区）、“反右”扩大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但另一方面，与民族的命运和历程相一致，却是在这些诗篇中有相当一部分都真实地反映了诗人成长和成熟以及不断追寻自我、改造自我和发展自我的基本历程。这是穆旦诗歌的双重意义所在。当然，就全部创作而言，也不限于这两个主题，而是具有更其广阔而丰富的思想内容，更其深刻而持久的文化内涵。

对于这些论题的追索和论述，就成为不断可资研究和探索的项目。

二、追寻穆旦：心路历程与主题探索

然而，穆旦之于我，作为一个诗歌和翻译的爱好者，完全是一个由偶然引发的学习和发现的过程，以至于成为一个精神的存在，持续地产生了影响。能说明和记录这种影响的，毋宁说是诗歌本身，尤其是我的诗歌创作，还有诗歌翻译，虽然是断断续续地和穆旦发生联系的，但考究起来，也有一段难忘的历史。这里简要回顾一下自己初识穆旦诗歌的际遇和此后的研究

路径,也许是不无意义的吧。还是先提一下我的《穆旦印象》的开篇:

想象中的你
从绿色的诗句中渗出
凝重而清新——好酷
如今来到你曾是的所在
冬日里你的形象
反而这般模糊

每一片叶子都留有你的踪迹
风,却不指点迷津

这首诗写于2000年12月26日,我初到南开大学的那个冬天。当我在南开园散步,看到路旁的冬青树,想起穆旦的“绿色的火焰”的诗句,于是写了这首诗。早些时候,那年夏天,我准备了一段时间的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以后,在西安解放路图书大厦的顶层见到了绿色封面的《穆旦诗全集》,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穆旦这个名字,由此开始了对穆旦诗歌的研究历程。老实说,穆旦的现代诗的确不好懂。相比之下,甚至比英美的现代派诗歌,庞德和艾略特,还要难懂。此后,在初到南开大学的岁月里,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反复阅读穆旦诗集中的146首(组)诗作,实际上是按照所谓的“解释学循环”,从局部推断整体,又从整体推断局部,这样一步一步展开理解的。后来,在基本搞懂的基础上,我从中挑选出六十多首,译成英文,并加详细的注释和解读,于2004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穆旦诗英译与解析》。就是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我提出自己对穆旦诗歌创作与翻译的研究分期,并提出“被围者”形象问题。另外,就穆旦新诗的翻译问题,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现代汉语直接通向英文语言的总体翻译策略,二是穆旦诗连贯多于中断的写作风格的保持方法,三是意象组合与时空调度上的分行分节和语序安排基本不做变化的考虑。关于第三点,不妨引录一段文字:

在意象组合和时空调度上,诗歌的意义布置和心理接受的前后顺序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译文尽量尊重原诗的分行分节和语序安排,除非有绝对理由,一般不做较大幅度的语序调整,即便忍受不太通顺和转折突兀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是新诗的特点之一。(王宏印著译:《穆旦诗英译与解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前言”第5页)

从2000年冬我调到南开大学以后，读穆旦的诗就成为我日常功课的一部分，须臾不能离开了。此后许多年，我每年都要从头阅读穆旦的诗作好几遍，从中寻找感觉和理念。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統研究以后，我将穆旦一生的诗歌创作和翻译活动，做了一个大致的分期论述：

第一时期（1934-1937）尝试期：主要是南开中学阶段，开始在《南开中学生》上发表诗作和文章，已经显示出早慧和诗才。

第二时期（1938-1948）高峰期：从清华到西南联大，再到解放前夕出国留学为止，穆旦的大部分诗作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创作思想、语言风格上最具代表性。是著名的“九叶派”诗人之一。

第三时期（1951-1957）受挫期：从解放初留学归国到“反右”运动，以《九十九家争鸣记》招来大祸，结束了这一时期艰难的适应和很难适应的创作实践。一般说来，这一时期的创作成就不很高，数量也不大，但有些诗作具有很强的资料和研究价值。

第四时期（1958-1977）翻译期：1958年接受机关管制，不能发表诗作，诗人以本名查良铮（实际上翻译活动开始于1953年）发表大量翻译作品，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普希金、丘特切夫等俄国诗歌以及拜伦、雪莱等英国浪漫派诗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翻译了英国现代派诗歌选集。其翻译成就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为译者赢来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翻译家之一的荣誉。翻译活动一直继续到1977年诗人去世。

第五时期（1975-1976）圆熟期：晚年的诗歌创作复兴，自1975年只有一首《苍蝇》戏作，诗人重新拿起诗笔，1976年诗人有近30首（组）诗作，其思想和艺术达到了圆熟老到、炉火纯青的很高境界，与前期诗风有明显不同。

一个要说明的情况是：上述最后一个时期，即诗人翻译家最后两三年的创作，和翻译活动几乎是并肩而行的，而创作到了最后一年，就已经停止了。因此这里所说的圆熟期，显然只能指诗歌创作，连同尝试期、高峰期和受挫期（包含政治上的受挫），可以用来说明诗歌创作的总体情况，而第四期的翻译期，则涵盖了很长一段时期，直到生命的终结。这样，原本在时间段上可以包含在第四时期的第五时期，却因为创作活动需要一个特殊的命名而分离出来了。当然，与此同时，各分期的命名原则，在逻辑上也就不完全统一了。

一个必须要说明的情况是，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穆旦和查良铮，在现实中是一个人，而在名义上，却是被分隔为两种印象和两种面孔。这一方面是说，作为一个统一的个体，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个人境遇下，他的活动和身份是现实的、实在的、真实的、无须怀疑的；但另一方面，随着创作与翻译

活动的阶段性的更替,活动方式的变换,个人身份的变换,以及对外名称(作品署名)的变换,也是一种文化人的适应和应对策略,是一种作家和翻译家对于个人生存的抉择,以及诗人和另类诗人(翻译家)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调整。关于这一问题,新近出版的《穆旦评传》的作者易彬有另一种表述:

进一步说,将“穆旦”与“查良铮”放置在一起,在材料并不充裕的情形下可提出的预设是:“穆旦”与时代之间大致是紧张→放松、投入→新的紧张;“查良铮”与时代之间则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良性关系:热切投入→为时代所接纳,出版机制转轨虽一度中断出版,但最终还是顺利接上。当“穆旦”犹疑、受批判的时候,“查良铮”却自如地游走于时代之中——积极地参与到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之中,“穆旦”与“查良铮”,境遇相对立的两张脸孔,却为同一个人所享有——与他共患难的妻子、一些熟悉他的友人和文化界人士自然也是知晓的,但在更广大的读者群、更大的时代空间里,形象分离已不可避免。(易彬:《穆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2-393页)

就每一个传记作者的动机而言,穆旦和查良铮,也可能给予分别的着重的关注,甚至分别写出诗人和翻译家两个不同的传记来。但就诗人穆旦而言,他的作品和心路历程,似乎可以较为容易地从他的诗歌创作的分期和代表作中看出一个大致的线索。从《穆旦诗全集》所收录的诗歌来看(当然,这一“全集”尚没有达到全部收录的程度),诗人一生共创作诗歌146首(组),出版诗集8部(生前3部:《探险队》1945,《穆旦诗集》1947,《旗》1948),翻译作品25部。此外,还写有少量论文和文艺评论,而其诗歌理论则反映在为数不多的书信和译文序跋中。如果把诗人第四时期的翻译期从整个创作过程中拿出来的话,那么,穆旦的诗歌创作便可有四个时期。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或许不止一种,兹列举如下:

第一时期(1934-1937)肇始或崛起期:《更夫》《野兽》

第二时期(1938-1948)丰收或高峰期:《合唱二章》《赞美》《诗八首》《森林之魅》

第三时期(1951-1957)适应或转型期:《葬歌》《九十九家争鸣记》

第四时期(1975-1976)成熟或衰退期:《苍蝇》《智慧之歌》

虽然这些分期和命名带有武断的性质,但若以穆旦一生的诗歌创作成就而论,则第二时期最具代表性,即代表了穆旦新诗的最高成就和最典型的诗风。那就是后来被称为“九叶派”时期的穆旦,也是和20世纪40年代中

国新诗高潮难分难舍的穆旦之所以著名的主要原因。

现代诗歌研究,除了其他方法之外,也可以按主题把一个诗人的全部诗作归结为若干类别,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诗人创作的广度和思考的深度,也可以洞见其时代精神和社会人生诸种问题,称为“主题研究”。穆旦的诗歌创作,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平建设十七年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到了粉碎四人帮的年代,诗人却因心脏病突发而撒手人寰,留下了一笔未来得及精雕细刻的译文(例如《奥涅金》的完全韵体修改刚过半而未及完成),和一个未能如愿以偿出版的诗集(穆旦有一个出版计划,但未来得及实现)。

大体说来,穆旦的诗歌可以分为以下十大类别。

1. 劳苦大众

劳苦大众,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所谓的“民本”思想的一个延伸,也是各个时期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在中国革命史上,尤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具有特殊的关注的意义。在解放前,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那个时代所关注的,主要是农业和都市体力劳动者,卖报人、洗衣工、打更人,对于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穆旦都有描述,其中的打更人(《更夫》),具有较为明显的象征意义,也代表那一阶段个人创作的水平。

2. 民族命运

民族命运的主题,是近世以来许多有志之士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动荡年代的诗歌创作和翻译的主旋律,英国诗人拜伦一部《哀希腊》的翻译,客观上记录了“五四”以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经历和心路历程。穆旦的《饥饿的中国》等诗篇,不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曾经翻译为英文在海外发表。解放以来,这个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实际上并未完全解决,反而以其他的形式变得较为隐蔽,引起更加深层的思考。

3. 战争思考

穆旦经历了抗日战争,亲身赴缅甸参加了中国远征军的征战,亲眼目睹了野人山大撤退的惨剧,贫困交加,差点饿死。作为诗人,他是写战争的高手,其中的《出发》《森林之魅》等名篇,将永久辉耀诗坛。关于战争,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和平与发展将成为主题,但是,不排除关于战争的思考,以及关于边境冲突的认识。

4. 浪漫爱情

爱情是人类生活的现实问题,也是诗歌创作的永恒主题。在古代文人那里,香草美人具有理想隐喻的性质,而在后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个人那里,会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观点。在穆旦的笔下,爱情虽然具有与战争相

联系的性质,例如,他写了《一个战士需要温柔的时候》,但他的《诗八首》则是对爱情的形而上学的探讨,所达到的高度至今无人能比。郑敏等人都曾解读过这八首诗,笔者也曾对他的《诗八首》做了详尽的解析。

5. 自我追寻

一般认为,中国人的自我观念不如西方人,但在现代,这一看法可能要发生转变。关于自我的追寻,在穆旦那里是和现代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并和体制内的个人成长史相表里,体现为个人意识长期被压抑的状态和心理宣泄的诗性表征,同时,他善于采用现代派诗人的立场和角度,加以诗意的表现,其中不乏借助翻译和仿拟进行的准创作,例如《我》《自己》《沉没》。

6. 自然景色

自然在穆旦那里是与社会对立的存在,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所以探索自然之奥秘成为他的诗歌主题之一,例如《自然底梦》《海恋》《云》,均有本体论探索的明显意图。只有《春》是一个例外,以抒发青春情感为对象。至于晚年所写的《苍蝇》,明显地是拟人,以诗人自己为感情投射的对象。及至以四季为题的诗作《春》《夏》《秋》《冬》,则具有明显的象征色彩,受到丘特切夫的影响颇多,而且在其中灌注了诗人本人的人生经历和生命哲理。其中又以《秋》《冬》最为著名。

7. 精神信仰

通过《隐现》和《祈神二章》等诗篇,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在穆旦的诗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尽管我们不能因此就称诗人为基督徒,因为诗歌中的信仰与日常生活中的信仰是不同的。诗人具有借助任何文化现象营造诗歌氛围的权利和能力,以便表达他心目中的情感世界和信仰世界,例如,面对社会的混乱和道德沦丧,诗人可能借助宗教信仰的高度,反思人类文明。这正是穆旦所做的,而且十分成功。

8. 文明反思

在某种意义上,诗歌是对现实的关注与文明的反思,缺乏这个高度的诗人是没有出息的诗人。但不同时代的诗人,具有不同的反思倾向,受到同代人的影响是一个外在的直接的原因,个人生活的遭际所导致的深度体验是其内在的动因。穆旦的诗歌,具有逃脱现代文明和反思人类文明两个维度,前者以《森林之魅》为代表,后者以《诗四首》为代表。《甘地之死》则是地方文明的一种探索维度。一般说来,具有宗教高度的反思,高于艺术的反思,若是就事论事地抱怨人生和社会,那就是诗歌的世俗化了。而文明的反思,可落实为不同的层面。